

---

# 理论与应用

---

## 2017 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研究<sup>\*</sup>

饶广祥 李佳悦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分析 2017 年中国符号学研究相关论文、著作、学术会议和学科建设情况等方面，总结出本年度符号学发展基本特点：符号学理论探索与体系建构进一步推进，哲学符号学研究成果丰硕，传播符号学等门类符号学发展迅速，大量实践门类学科的符号学应用越来越多样化，但门类符号学发展时应避免内容的同质化或模糊化倾向。

**关键词：**符号学，发展状况，哲学符号学，传播符号学，交叉学科

## 2017 Annual Report of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Rao Guangxiang, Li Jiayue

**Abstract:** The features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in 2017, a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basing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emiotic research papers, monographs, conferences as well as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s of the year. The systematicall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semiotics has been continuously promoted, in which philosophical semiotics yields fruitful achievements. Rapid yet diversified expansion

---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的阶段性成果。

## □ 符号与传媒 (16)

happened in applied semiotics, such as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homogenization and vagueness which have been emer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ed semiotics must be avoided.

**Keywords:** semiotics, state of development, philosophical semiotics,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interdiscipline

**DOI:** 10.13760/b.cnki.sam.201801015

### 一、2017 年中国符号学研究概况

#### (一) 论文发表情况

本年度(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15日)在“中国知网”上以“符号学”为主题的文献共784篇,比2016年的865篇数量略少。根据“中国知网”的主题分类,在这784篇“符号学”主题文献中,“新闻与传媒”类文章数量与去年基本持平,为88篇;中国语言文字、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以及建筑科学与工程方向相关文章数量下降明显,分别由去年的114篇下降到今年的86篇、由99篇下降到83篇、由106篇下降到72篇、由61篇下降到48篇。相对地,贸易经济、轻工业手工业、哲学、体育、工业通讯技术及设备和旅游等学科相关论文数量有小幅增加。从论文数量的变化可以大致看出,今年学者更倾向于扩展符号学解释领域,而“中国语言文字”“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等符号学的传统领域研究则热度稍减。

#### (二) 学术活动、学科建设情况

本年度符号学相关学术活动、学科建设活动众多,主要关注媒介融合背景下符号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之间的关联影响和交叉研究,对符号学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的应用有深入探索。全国各大高校的符号学研究呈现出立足实际、连点成面、形式创新等特点。

7月15日至16日,第二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会在贵州兴义市召开。研讨会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院)、贵州师范大学、黔西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会议以“符号与媒介”为主题,来自全国十余所高校的150余名传播学、符号学领域代表在会上探讨了文化、社会各领域的符号学表征与传播学应用。本次会议还设立了学术圆桌会议及研究生论坛,为参会代表和学生们提供了更加包容、

高端的交流平台和学习氛围。

10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六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在无锡江南大学举行。来自全国高校语言学、文学、传媒界等符号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68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各位学者就翻译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等方面议题展开讨论，在“符号本体论与翻译研究”“符号与文学、艺术研究”和“符号与语言、话语研究”等内容上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6月17日至18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由其英语学院主办的“第一届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本届研讨会旨在交流语言学本体研究、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及其他语言学交叉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来自国际国内100余名专家学者及硕博研究生围绕语言学、符号学、认知语用、话语分析等话题展开讨论，对语言与符号学理论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有益的分析。

另外在国际上，6月26日至30日，第十三届世界符号学大会在立陶宛考纳斯科技大学召开。本届大会由国际符号学会主办，主题为“Cross-Inter-Multitrans”，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近50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上，学者们从理论和方法两个角度反思当代符号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展望了未来符号学发展方向。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会长王铭玉率团队参加并做会议发言。

这一年来，在学科建设和符号学交流常态化发展上，各高校亦扎实推进。

如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开明论坛”，从符号学角度进行了“情感—风格—修辞”等主题讨论会。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于3月末开展电影《降临》符号学双语研讨会，瑞典隆德大学认知符号学中心学者Michael Ranta进行了主题演讲，研讨会从符号学、语言学、哲学、艺术学等多个角度对该电影进行讨论，获得了师生的高度评价；9月下旬，以“AlphaGo大战柯洁”为引，开展了“意义理论的一个特殊问题：符号升级，人工智能必须有限制吗”主题学术讲座，赵毅衡教授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作为一符号主体表现的意义，为意义理论和科技前沿的结合拓宽了思路。

这一年在符号学教学形式内容创新方面也有所突破。9月，由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赵毅衡教授率领名师团队担纲的“意义生活：符号学导论”超星慕课正式上线。本课程是国内第一门聚焦符号学的慕课，内容重点关注符号学基础体系与符号学在各领域的实践，打通理论与应用的壁垒，扫清对符号的误解，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符号学。这一创新形式在学界和网

络上引起强烈反响,短短数月,访问量已逾 18000 人次<sup>①</sup>。

近年来,全国各大高校的符号学研究交流合作不断加强。5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17年符号学基地建设研讨会”在兰州召开,会议期间四川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5所高校的符号学研究机构成立“中国符号学基地联盟”,旨在将进一步加强符号学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整合资源、信息和人才优势,提高科研和创新能力,最终实现学术信息资源共享,扩大会在国内学术界以及国际符号学界的影响力。

### (三) 专著出版情况

过去一年中<sup>②</sup>,国内<sup>③</sup>专著译著出版量与去年大致持平,共有29本新书面世,内容既有对符号学理论自身的建构和拓展,又有其他相关领域对符号学的诠释和应用。总体来说今年符号学研究著作的发展延承了去年的特点,表现为三个“推进”:

一是进一步完善符号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探索新的研究方向。符号学本体论研究方面,赵毅衡(2017)出版新书《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尤其值得一提,该书是其“形式论三书”的第三本,意在回答符号学领域中一系列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设法让符号学跳出仅仅是方法论的地位”,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张碧,唐小林,2016)、《波德里亚网络符号思想研究》(于骐鸣,2017)等,都致力于从经典理论流派中洞察符号学进路。

二是进一步拓宽符号学思想的解释领域。传播和跨文化交际领域出版了如《传播符号学访谈录:新媒介语境下的对话》(蒋晓丽,赵毅衡,2017)、《传播符号学教程》(冯月季,2017)、*The Patterns of Symbolic Communication* (Sui, 2017a)等,致力于讨论符号与传播的结合;市场领域出版了《馈赠的社会符号学》(赫尔穆特·贝尔金,2016)、《商品符号学文集》(饶广祥,2017)等,讨论了符号学的社会化功用;文化、艺术领域亦有《流行音乐与文化关键词》(布鲁斯·霍纳,托马斯·斯维斯,2016)、《符号学视野下的先

---

① 数据来源:《超星发现:意义生活:符号学导论》,链接:<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0051851.html>。

② 笔者注:因《2016年中国符号学发展年度报告》未涵盖2016年12月份出版的专著译著,鉴于该段时间新出版书目较多,内容具有重要性,同时为了提升本报告统计的准确性,故将相关专著译著统计时间段划定为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特此说明。

③ 笔者注:由于时间和资料限制,本文所统计专著及译著仅包括中国大陆的符号学研究成果,未覆盖港、澳、台地区。特此说明。

秦名辩学研究》(陈道德,曾祥云,2017)等出版。上述著作从不同领域促进了符号学边界的进一步扩大,符号学对文化研究的影响继续深入。

三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实践进一步向符号学方法论转向。小说和翻译研究如《符号的世界——艾柯小说研究》(李静,2017)、《符号·翻译·英诗》(夏家驹,时汶,2017)等;文化方面如《体育符号:体育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董青,洪艳,2017)、《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蒙象飞,2017)等;此外还有徐伯初所著的《铁路货车涂装色彩的符号语义》(2017)、周丰所著的《符号之水——知识科学的方法与探索》(2017)、陈圣浩所著的《景观意义的建构与传达——语言符号理论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2017),都在特定研究对象的论述上与符号学结合,反映出符号学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 二、2017年符号学理论研究

这年我国的符号学理论研究涌现出众多成果,传统回溯与现实导向兼而有之,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展、传播符号学话题强势、跨学科符号学研究丰富且讨论更为精细。

首先,著作方面,符号学专著比重增大,产生了一些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建设性成果,并在内容上明显表现出“追根溯源、回归传统、探究本质”倾向。如赵毅衡所著《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2017a),将意识和意义作为贯穿整个讨论的核心概念。赵毅衡深入分析二者关系,以“形式直观”来建立“从意识获得意义”的机制。本书是其“形式论三书”第三本,与前两作一同在符号学研究上形成了逐渐深入的整体——《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推进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拓展了其研究疆域,将符号学作为方法论,广泛应用于文化分析;《广义叙述学》(2013)则从研究对象出发,从文学领域拓展至广告、影视、游戏等广义叙述体裁研究,在具体理论上将符号学和叙述学结合,开拓了新的领域;到《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则将符号学本体论作用在哲学符号学的建立之上,牵连意义与意识的关系,讨论意义的产生、经验化和社会化。

此外,这一年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内容丰富:张碧、唐小林编著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2016)和胡易容、陈文斌编著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2016),都聚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进路,前者对语义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系统与社会再生产等进行深入讨论,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欧洲的流派发展研究提供了清晰的视野;后者则系统梳理其

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的总体发展状况,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做宏观呈现,并回应了一些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大争论。于骐鸣在《波德里亚网络符号思想研究》(2017)中对波德里亚符号学思想展开评价和反思——该作联结起康德、海德格尔等人的“物”的观点,进而沿着波德里亚“符号的物—物的符号—网络符号”这一脉络,建立网络符号发展逻辑,对解决数字化生存困境提出一些创新观点。赵勇刚所著的《文化政治与符号权力——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2017)通过追溯费斯克微观政治思想与伯明翰文化政治思想之间的传承关系,以“文化政治”思想为主线,评述“对抗”“日常生活”等关键词,从而突出“符号权力”的核心主题。

传播符号学理论的相关探索今年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独立的模块。蒋晓丽、胡易容、冯月季、赵星植等多位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传播学与符号学的关系,探究传播符号学的历史脉络、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传播符号学教程》(冯月季,2017a)的作用在于“打基础”——通过现代神话、符号身份、多模态传播世界的建构,最终让传播回归文本、让传播符号学回归传播。《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赵星植,2017b)作用在于“溯渊源”——让传播符号学回到皮尔斯,通过梳理皮尔斯三元符号传播模式等关于传播与符号的论述,极大扩展了传播符号学内容体系的纵深。《The Patterns of Symbolic Communication》(Sui,2017a)和《China in Symbolic Communication》(Sui,2017b)作用在于“看现状”——前者对经典符号学关键理论做了深入批判,结合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提出借力传播、合力传播等创新概念,为符号学研究增添实用维度;后者则基于符号学和传播学的跨学科理论,解释隐藏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符号和社会现象,研究经典中国符号在历史中的演变。《传播符号学访谈录:新媒介语境下的对话》作用在于“找方向”——聚焦融媒介背景下新闻传播业的现状,借数十位领域前沿学者之眼,管窥传播学与符号学的发展趋势。

同时在论文方面,这年涉及传播符号学回顾与发展的亦占有较大比重。首先有学者辨析“符号传播学”和“传播符号学”两个术语的不同定义,认为前者是用符号学的方法来分析传播现象,是为符号传播学;后者则是将传播学引入符号学,进而揭示符号学世界观在传播现象中的体现(张骋,2017b)。有学者从学术史角度考察了皮尔斯符号学在传播学中的发展轨迹:皮尔斯符号学对传播问题的影响在上世纪由强到弱,再到90年代以来因传播学理论与范式的更新需求,许多传播学者“重访皮尔斯”,为当代传播学理论

发展轨迹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路径（赵星植，薛晨，2017）。作者还指出，皮尔斯所建立的三元符号传播模式相关研究体系，皆按照“人如何利用符号交流意义、分享意义、建立意义共同体”的逻辑展开；这一路径使其符号学呈现出开放、动态的整体特性，实现对结构主义的超越（赵星植，2017a）。此外，另有学者将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引入传播符号学研究——作者指出：认知神经科学与传播符号学共享符号学基础，能够对传播符号学理论的完善与提升提供跨学科支持；并尝试以前沿认知神经科学方法探索传播符号学理论研究新范式（诸葛达维，2017）。

除传播符号学议题成为这一年的强势内容外，其他符号学理论相关论文亦表现出相当新意。这一年来不少学者对符号学自身理论进行了检视和发展：有学者探究了意义问题，指出其是分析哲学、现象学、符号学共同的核心问题，要建立一个哲学符号学的意义理论，就必须辨清它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可能的重叠；作者欲通过分辨皮尔斯与胡塞尔在符号与意义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返回皮尔斯提出的符号现象学，以期找出一条哲学符号学意义理论之路（赵毅衡，2017b）。

也有研究对符号学基本概念、术语和理论进行了重新检视，以求更加坚实符号学之根基——如有学者对指示性在符号学分类中所处的地位进行了辩论。一种观点认为，符号与对象的指示性关联是最基本的、最原初的意义关系，可以不卷入经验就产生意指，因此作者认为皮尔斯“三分法”中将“像似性”作为符号表意第一性的说法值得商榷（赵毅衡，2017c）。针对此观点，另有学者指出，考虑指示性的因果性、空间性、关系性特征，以及其对“先验意识进行符号现象的认知活动”的引导，指示性在实际的符号过程中仍然是第二性的、“是在作为第一性的像似性之获得的基础上形成的”（彭佳，刘玲，2017）。有学者关注“象征”这一概念的辨析，指出了西方符号学理论“symbol”一词的多义性使用所导致的中文术语翻译混乱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辨析象征中的“自然联系”与“任意性”复合符号关系，以此厘清索绪尔与皮尔斯符号学在范畴、体系及适用性方面的差异（胡易容，2017）。再者，“符号六因素”的相互影响也在今年的研究中有所体现。文章通过分析六种三组符号因素的组内对立关系，认为当代文化呈现出三种主导引发的倾斜变异：诗性压倒指称性，引出“泛艺术化”；意动性超过表现性，引发传播的“符用转向”；接触性胜过元语言性，造成当代文化影响日益深远的“超接触性”（陆正兰，赵毅衡，2017）。还有学者对标出性理论进行检视，指出中项的摇摆和偏边幅度和受力大小是衡量文化宽容度的重要指标；同时借格雷马

斯方阵分析指出,中项融合了非正非负、亦正亦负的元素,是漩涡式的存在(彭佳,2017b)。也有学者发展了话语分析,指出它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对符号表意实践与社会行为、意识形态之关系分析具有独特的贡献,是当代符号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展面(赵星植,2017c)。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一直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今年的相关研究在此方向上表现尤为突出。有学者致力于探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当代价值,认为符号社会具有前所未有的社会表征;而回到经济基础、商品分析,是处理符号问题的必由之路(唐小林,饶广祥,2017)。进而有学者牵连起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西方文化产业理论,指出西方文化产业理论虽推进路径不同,但都包含马克思主义批判内核以及符号学思维(陈文斌,2017)。有学者分析了罗兰·巴特符号学的社会面向,指出受到过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他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谎言和意识形态伪装,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矛盾(唐小林,2017)。另有学者从意识形态批判层面进一步展开,对比了神话学和符号学的个中差异,认为从神话学方法向符号学方法的转换,表现出罗兰·巴特的包含历史主义的结构主义转向(龙佳解,陈磊,2017)。还有人从波德里亚批判思想切入,指出其消费意识形态的批判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但同时,正是将符号学方法推向深入,促使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基本原则,发展出了拟像、仿真、内爆和超真实等“后现代主义”性质的学说(杨建刚,2017)。

此外,也有研究从过往符号学家关于语言、符号的论述中找到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新观点和新解释。比如对皮尔斯的“三分法”,有文章认为,皮尔斯符号意指过程、符号本身和符号与对象的关系都是三分主义,符号无限意指过程的增长和意指过程间接证明了人类是使用符号进行交际的(孙彦彤,王慧,2017)。另有学者以皮尔斯这一三元符号理论为基础,融合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心理学理论,提出“活动符号学”理论模式,该模式认为解释过程是“一种典型的以符号为媒介的解释活动”(李允熙,赵星植,2017)。又如索绪尔的“二分法”,有文章认为,语言是靠区分性原则运作的,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也即“所指”和“能指”(赵奎英,2017)。还有学者关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演变思想,指出其演变内因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外因在于交际;这种语言运用因语言交际的社会性和时间进程而最终演变(聂志平,2017)。有研究者聚焦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论在媒介批评领域的价值,指出结构主义符号学对媒介现象的解读不仅能进行意义分析,更能揭示媒介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哈文君,



2017)。

“反思”是符号学中关于“人”的独特性进行解释的重要概念。这年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人文、自然层面的现实观照。有论文面向“生态符号学”，提出“人”作为符号学动物，是唯一能在全球化带来的符号同质化进程中转换性地思考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生物，因此作者认为，只有人能够对其他生命体负起终极的伦理责任（彭佳，2017a）。亦有学者同归而殊途，探究中国古代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的进路，指出伦理符号学是“认为人类符号活动与生命活动同步”的一种符号学视域，因此要求符号学回到人类符号活动的价值论维度（祝东，王小英，2017）。

一些文章探究了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有学者深入考证俄罗斯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兴衰，将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本身视作一种文化和符号现象加以剖析（陈勇，2017a）。此外，作者还聚焦过渡期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对雅各布森的符号分类思想、语言符号学理论，以及巴赫金话语、对话理论等进行了梳理分析（陈勇，2017b）。

### 三、2017年符号学应用研究

2017年学者继续关注符号学在其他学科的应用问题，并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将符号学针对性地深入市场及社会学领域。

王铭玉（2017）主编的《语言与符号（第2辑）》关注认知科学与符号学的结合，探讨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开展和促进语言与符号学理论和应用的研究；陆正兰、刘小波（2016）翻译布鲁斯·霍纳等编著的《流行音乐与文化关键词》，考察文化研究中流行音乐在意识形态、话语、历史、政治等概念下的理解方式，并分析流行音乐中的文本、场景、形象等元素；闫文君（2017）所著《名人：一项传播符号研究》，致力于用传播符号学视角解释名人的形成机制；魏全凤、廖洋昇兰（2016）翻译赫尔穆特·贝尔金所著的《馈赠的社会符号学》，从文化史的角度对馈赠这一矛盾结构的道德潜力和综合潜力进行分析，重新检视社会理论维度，得出“个人主义团结”的独到观点；贾佳（2017）所著的《打扮：作为身体符号》将人的打扮行为作为一种身体符号来理解，以此分析打扮的社会意义；饶广祥（2017）等编著的《商品符号学文集》，以商品符号学的若干理论问题为切入点，从“符号化的商品”和“商品的符号化销售”两方面对商品领域的符号学特征做案例分析，开拓了学者们对于商品、广告、营销等与符号学之关联的认知与理解；陆方（2017）的《动画电影符号学》对视觉符号、设计创意、动画电影的语义沟通

及意义构成进行了有益的研讨；段炼（2017）在《绘画中的符号叙述》将符号作为绘画的分析单元，分析绘画的意义传达。此外亦有学者关注“古今”或“中外”，如陈道德、曾祥云（2017）编著的《符号学视野下的先秦名辩学研究》用符号学范式探究我国先秦时期的辩学，以“问题”为线索，让名辩学回归文本；王俊花（2017）在《皮尔斯与中国古典美学》中，以皮尔斯现象学和符号学为参照，分析了中国古典美学内涵以及符号在美感中的作用；郭景华（2017）在《中西跨文化符号学对话》中将符号学引入跨文化交际学，独具匠心地尝试用赋义和解码等原理解释跨文化交际冲突的本质。

今年符号学继续深入相关研究领域，在研究实践上倾向于使用或部分使用符号学分析文学、体育、景观等具体案例，很好地体现了其“文科公分母”的作用：张颖、王小姣（2016）翻译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所著的《诗性语言的革命》，汇聚各路理论，批判分析大量文本，指出19世纪后象征主义的先锋性在文学“再现”中引发了一场实在的突变；夏婉璐（2017）等人所著的《身份、创伤、符号——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谭恩美研究》，从文化符号学分析的角度探讨了跨文化语境下的谭恩美和谭恩美小说中的符号与意识形态建构问题；李静（2017）所著的《符号的世界——艾柯小说研究》致力于给艾柯的小说以合理的符号学诠释；夏家驷、时汶（2017）合著的《符号·翻译·英诗》则从社会符号学理论视角上阐释了符号学在翻译中重要性。

随着近年来我国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有学者随之关注我国国家形象建构问题，如董青、洪艳（2017）合著的《体育符号：体育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从符号学角度对体育与全球化、政治、媒介仪式、跨文化交流、国家形象构建中国文化认同等问题由现象描述转向深层结构的研究与阐释；又如蒙象飞（2017）《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探讨了文化符号在建构身份、塑造形象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选择原则和传播策略，从侧面凸显了符号学之于社会建设层面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论文方面，这一年来，我国音乐符号学、电影符号学、翻译符号学等在具体现象和事例上的应用交相辉映，新闻学、法学、景观学、建筑学等学科与符号学的交叉千丝万缕，以符号学为基础，多学科彼此连点成网、充分涌流，符号学对社会生活的强大解释力驱动各个领域向符号学靠拢，形成诸多深有见地的学术成果。

如艺术与音乐、电影符号学方面。音乐、电影等作为艺术的具体表达形式，具有明确的“文本”，符号学分析具有天然的优势。有学者通过对塔拉斯

蒂关于音乐符号学的代表作《音乐符号》的解读，探索其音乐符号学思想，并简要梳理了中国音乐符号学的发展（刘小波，2017）。有学者分析电影《应许之地》，指出导演桑塔格对洛特曼电影符号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为创作新现实主义的“散文电影”、促发电影符号学理论革新向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纵深转向、补充结构主义电影符号学思想的抒情维度（张艺，2017）。还有学者尝试用文本符号和意义传播相关理论考察武侠电影中武术负面形象产生的语境，指出武侠电影文本的片面解读导致其文化意义的缺失（王柏利，2017）。

传播、新闻符号学方面。有学者试图以符号学视角阐释媒介文本意义如何生成。论文指出，符码与元语言既是生成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规则，也是人们解释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资源，因而将二者引入传播研究，可实现后者新的理论转向（冯月季，2017b）。亦有学者关注了眼下火热的网络直播现象，论文立足于网络直播的符号互动与意义生产，指出其受到青睐是得益于传播符号体系的编解码规则运用（关萍萍，2017）。还有研究者涉足时尚领域，提出“结构”和“互动”是时尚符号学研究的两条路径：一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传统，以整体性的静态视角把握时尚的意义构建；二是皮尔斯符号互动理论，以动态的视角分析时尚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中的生成过程。最终指出，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更全面地分析各种时尚事件（廖茹菡，2017）。有研究认为从“新闻学”到“媒介学”是以符号学为基础的学科升华。作者指出，若只将符号学理论方法引入新闻学，并未给新闻学带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观点；而应该利用符号与媒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让新闻学走向媒介学（张骋，2017a）。

语言与翻译符号学方面。话语分析是近来符号学与语言学研究的热门方向。有研究者试图解读罗兰·巴特对叙事话语结构、未来话语符号学雏形建构等相关论述，重新审视罗兰·巴特在法国符号学从系统语言学模式到话语语言学模式的关键转折阶段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韩蕾，2017）。此外，语词的符号修辞也有学者关注：文章指出转喻功能是对琴棋书画概念的文化取象认知；隐喻功能是将上述概念的认知成果进行特征映射的跨域认知，从而规约和建构了新的认知概念（王枫，2017）。另外，翻译学与符号学的结合问题亦有大量学者讨论：有学者认为当代翻译研究开始延伸到普遍符号学范畴，指出符号意义的创造存在于翻译和解释翻译行为的另一套符码体系中（姚婷婷，2017）。另有学者关注翻译当中的“对等”问题——如试图通过莫里斯符号学理论对该问题的改善提出建设性意见（赵杨，2017），或分析电影字幕翻译的

符号三要素、字幕翻译过程及翻译对等等层面(潘琳琳, 2017)。另有研究发现, 翻译的动机和意图在联接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动态过程中会出现过度阐释或不足阐释导致的语义增生或衰减, 而从编码与解码、符号模式化系统及符号域等角度解读翻译, 可为翻译符号学的理论建构提供支持(寇福明, 吕红周, 2017)。

商品、品牌符号学方面。这一年研究者对商品符号学的案例研究颇多亮点。如研究流行音乐, 认为当代消费社会下的流行音乐是一种符号化的商品行为: “流行”是音乐符号表意的基本方式和音乐文化商品的产业逻辑, 流行音乐文化和商品具有“一体两面性”(陆正兰, 2017)。又如研究旅游, 有学者指出旅游是整合了三个层面意义的符号活动: 基于旅游人行为活动探讨之“人观”、基于旅游设施提供和产业发展之“物观”及人与物、社会和自然进行互动之“关系论”, 进而论证旅游的本质为商品符号(饶广祥, 朱昊贇, 2017)。还有学者关注“包装”的符号学内涵, 通过波德里亚社会符号学理论对诱惑性的产品外观进行分析, 指出产品的“诱惑性”的多种体现, 落点于设计对于诱惑之物的价值与代价的考量(伍宇宙, 邹晓松, 原佳丽, 2017)。

除前述内容外, 符号学亦在如下讨论中有所体现。祝东(2017a)着力于分析先秦诸子百家对于“形”和“名”的意义建构, 提出社会规范始于“名”的符号规范; 同时“礼”与“法”亦是对人表意行为的规约规则——“儒表法里”的实质是“动制同源”, 礼法互用是对儒家道德自律下形成的制动价值的肯定(祝东, 2017b)。武晓慧(2017)将符号学引入刑事证据问题研究, 认为皮尔斯符号学原理与刑事证据科学对于真相的认知具有内在一致性; 指出将刑事证据转化为符号并运用符号语法学、批判逻辑学及普遍修辞学等符号规则阐释证据的真实关联性, 有助于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宗争(2017)用符号学分析游戏文化机制, 认为窥测“符号—意义”组织形式是通达游戏—体育文化机制研究的必经之路。罗蔚(2017)分析了符号学在平面设计中的发展和运用, 指出符号学以及平面设计学衍生到美学的理解在当下有了更多元化的理解。李轶、颜铭(2017)分析了符号学环境艺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酆诗原(2017)借助景观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解读惠州西湖“十二景”的景观设计意义, 等等。

#### 四、2017年符号学发展总结

纵观2017年中国符号学发展状况, 可以发现符号学学科建设蓬勃向上, 理论探索稳步推进, 应用实践充分扩展, 形成了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

成果。在符号学理论上,这一年来学者既有对西方符号学经典理论的回溯、批判和继承,又有结合中国语境的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相关研究、皮尔斯和索绪尔符号学思想的重访与升华,是对经典符号学研究的尊重,同时也是结合中国符号学研究做出的“本土化解码”;而在批判继承经典符号学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哲学思辨、探究本质而进行的符号学本体论研究,则代表了中国符号学发展的原创动力和思维最前沿。

传播符号学作为近年来符号学研究的“明星”,其话题的热度依然持续,研讨方向更加贴合社会发展状况。“传播”与“符号”的结合,是媒介融合背景下传播学理论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符号学参与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这一年来符号学在具体应用方面表现出的对人文社科的解释力更为增强,其涵盖边界更为扩大,各门类符号学欣欣向荣,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交融日益明显。这反映出,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符号学之于社会科学的基础性作用,数十年符号学者的辛勤研究换来今天符号学的蔚然大观,实属一幸也。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近年来中国符号学发展虽稳步前进、理论与应用研究成果丰富,但是亦有问题露出端倪:随着学者们意识到符号学对于社会科学的强大解释力,将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纳入其他社会学科加以分析似成为“流行”,各类符号学相关交叉学科纷纷涌现,这在一方面确实丰富了符号学的研究内容,但在另一方面却造成各交叉学科之间再次“交叉”的情况,个别门类符号学之间研究内容存在同质化或模糊化倾向。如何让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运用更加规范、让门类符号学的学理脉络更加清晰,也许是相关研究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 引用文献:

- 贝尔金,赫尔穆特(2016). 馈赠的社会符号学(魏全凤,廖洋昇兰,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陈道德,曾祥云(编)(2017). 符号学视野下的先秦名辩学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陈圣浩(2017). 景观意义的建构与传达——语言符号理论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 陈文斌(2017).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域下的西方文化产业理论. 江西社会科学, 8, 97-103.
- 陈勇(2017a).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研究综览. 外语教学, 38(2), 44-49.
- 陈勇(2017b). 过渡期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概览——以雅各布森与巴赫金的研究为代表.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40(5), 63-72.

## □ 符号与传媒 (16)

- 董青,洪艳(2017). 体育符号: 体育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
- 段炼(2017). 绘画中的符号叙述.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冯月季(2017a). 传播符号学教程.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冯月季(2017b). 符码与元语言: 媒介文本意义生成的符号学阐释.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4(4), 110-114.
- 关萍萍(2017). 网络直播的符号互动与意义生产——基于传播符号学的研究. 当代电影, 10, 187-189.
- 郭景华(2017). 中西跨文化符号学对话.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 哈文君(2017). 媒介批评视野下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论价值初探. 纳税, 11, 132.
- 韩蕾(2017). 话语符号学视角下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中国文学研究, 1, 10-14.
- 胡易容(2017). 论象征: 理据性与任意性在传播中的复合——从一篇学术论文的术语辨析说起. 新闻与传播研究, (4), 14-24.
- 胡易容,陈文斌(编)(2016). 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霍纳,布鲁斯,斯维斯,托马斯(编)(2016). 流行音乐与文化关键词(陆正兰,刘小波,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贾佳(2017). 打扮: 作为身体符号.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蒋晓丽,赵毅衡(编)(2017). 传播符号学访谈录: 新媒介语境下的对话.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克里斯蒂娃(2016). 诗性语言的革命(张颖,王小姣,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寇福明,吕红周(2017). 从符号学看翻译. 外语教学, 38(2), 91-94.
- 李静(2017). 符号的世界——艾柯小说研究.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李轶,颜铭(2017). 符号学环境艺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福建茶叶, 8, 131-132.
- 李允熙,赵星植(2017). 活动符号学绪论.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9(2), 167-171.
- 邴诗原(2017). 岭南传统园林景观意象的符号学研究——以惠州西湖“十二景”为例. 37(3), 103-108.
- 廖茹茵(2017). 结构与互动: 时尚符号学研究的两条路径. 载于曹顺庆,赵毅衡(主编), 符号与传媒, 15.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刘小波(2017). 符号学视阈中的音乐及音乐研究——以塔拉斯蒂《音乐符号》为例.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1, 175-183.
- 龙佳解,陈磊(2017). 论罗兰·巴特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从“神话学”到符号学的转换.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10, 166-172.
- 陆方(2017). 动画电影符号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陆正兰(2017). 流行音乐的商品符号学研究. 载于曹顺庆,赵毅衡(主编), 符号与传媒, 14.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陆正兰,赵毅衡(2017). “超接触性”时代到来: 文本主导更替与文化变迁. 文艺研究,

- (5), 18-25.
- 罗蔚 (2017). 符号学在平面设计中的发展和运用. 大众文艺, 19, 117-118.
- 蒙象飞 (2017). 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 聂志平 (2017). 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发展演变理论——纪念《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百年之二. 人文杂志, 7, 80-86.
- 潘琳琳 (2017). 电影字幕翻译之翻译符号学解读.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5 (2), 125-129.
- 彭佳 (2017a). 人的主体维度: 符号学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 鄱阳湖学刊, 4, 51-60.
- 彭佳 (2017b). 中项漩涡: 文化标出性与格雷马斯方阵.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50 (5), 92-97.
- 彭佳, 刘玲 (2017). 论先验意识的指示性框架及作为第二性的指示性: 兼与赵毅衡商榷. 上海大学学报, 34 (6), 114-124.
- 饶广祥, 朱昊贇 (2017). 作为商品的旅游: 一个符号学的观点.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 (主编), 符号与传媒, 14.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饶广祥, 朱昊贇, 刘楠 (编) (2017). 商品符号学文集.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孙彦彤, 王慧峰 (2017). 论皮尔斯符号意指过程中人的独特性. 北方文学 (下旬), 7, 255.
- 唐小林 (2017). 论罗兰·巴尔特符号学的社会面向.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9 (3), 3-7.
- 唐小林, 饶广祥 (2017-3-30).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当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 004.
- 王柏利 (2017). 武侠电影中武术形象生成的传播符号学阐释.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36 (5), 139-144.
- 王枫 (2017). 特殊语词符号化的转喻、隐喻功能及其文化内涵——以琴棋书画系列语词为例.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38 (5), 160-165.
- 王铭玉 (编) (2017). 语言与符号 (第2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伍宇宙, 邹晓松, 原佳丽 (2017). 诱惑性产品外观的社会符号学解读. 包装工程, 38 (6), 114-117.
- 武晓慧 (2017). 符号学场域中的刑事证据问题研究论纲. 证据科学, 25 (2), 204-212.
- 夏家驷, 时汶 (2017). 符号·翻译·英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夏婉璐, 汤平, 吕琪 (2017). 身份、创伤、符号——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谭恩美研究.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徐伯初 (2017). 铁路货车涂装色彩的符号语义.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闫文君 (2017). 名人: 一项传播符号研究.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杨建刚 (2017). 批判理论的符号学拓展——鲍德里亚学术研究中的符号学方法. 文艺理论研究, 5, 140-151.
- 姚婷婷 (2017). 塔尔图符号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俄罗斯文艺, 3, 147-154.

## □ 符号与传媒 (16)

- 于骥鸣 (2017). 波德里亚网络符号思想研究.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张碧, 唐小林 (编) (2016). 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 (周劲松, 等,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张骋 (2017a). 从“新闻学”到“媒介学”: 以符号学为基础的学科升华.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1 (4), 128-131.
- 张骋 (2017b). “符号传播学”与“传播符号学”: 一对不能相互替代的术语.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 (主编), 符号与传媒, 14.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张艺 (2017). “根系于一地的公共情感”的再现与认知——从洛特曼电影符号学视角走进桑塔格导演电影《应许之地》.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0 (4), 59-66.
- 赵奎英 (2017). 艺术符号学基础的反思与现象学存在论重建. 文艺争鸣, 4, 150-157.
- 赵星植 (2017a). 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 国际新闻界, 6, 87-104.
- 赵星植 (2017b).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赵星植 (2017c). 论话语分析与符号学研究.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 (主编), 符号与传媒, 15.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赵星植, 薛晨 (2017). 皮尔斯符号学在传播学中的发展轨迹: 一个学术史考察.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9 (2), 172-178.
- 赵杨 (2017). 符号学视域下的英译对等——以《边城》为例.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0 (5), 88-92.
- 赵毅衡 (2011).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13).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17a).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17b). 意义理论, 符号现象学, 哲学符号学.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 (主编), 符号与传媒, 15.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17c). 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 上海大学学报, 34 (6), 104-113.
- 赵勇刚 (2017). 文化政治与符号权力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周丰 (2017). 符号之水——知识科学的方法与探索.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诸葛达维 (2017). 传播符号学跨学科研究的新视角: 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 (主编), 符号与传媒, 14.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祝东 (2017a). 论形名: 从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 江西社会科学, 8, 104-111.
- 祝东 (2017b). 礼与法: 两种规约形式的符号学考察.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4 (5), 131-140.
- 祝东, 王小英 (2017). 中国符号学传统与社会伦理重建——中国古代伦理符号学思想研究的进路. 山东社会科学, 8, 67-72.
- 宗争 (2017). 射何以成道——游戏文化机制的符号学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43 (2), 37-41.



Sui, Y. (2017a). *The patterns of symbolic communic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Sui, Y. (2017b). *China in symbolic communic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作者简介:**

饶广祥, 四川大学广告学与符号学副教授,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产业与商品符号学。

李佳悦,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 主要研究方向: 传播符号学。

**Author:**

Rao Guangx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dvertisement and semiotics,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the ISMS. His research field is semiotics of commodity and industry.

Li Jiayue,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is research field is 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

Email: raoguagnxiang@163.com 614665290@qq.com